

普金会对解决半岛问题是建设性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普京表示支持缓解半岛的紧张局势,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表示要加强俄朝的经济关系,普金说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这是普金与金正恩的首会,也是俄朝领导人八年来的第一次见面。这不仅是俄朝关系的大事,也对解决半岛问题具有建设性,有利于围绕半岛问题国际因素的平衡。

俄罗斯是当年六方会谈的参加国之一,其基本立场包括主张半岛无核化,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等,美韩一直怀疑俄朝借半岛问题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但莫斯科几乎没有过这种“搅局”的实际表现。普金会就半岛核问题具体谈了哪些内容,目前双方公布的信息有限,但这一谈话应当是莫斯科的一贯态度和立场。去年以来所展现的立场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朝鲜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俄朝举行首脑会谈有助于扩大缓和半岛局势的思路。作为朝鲜的三个陆地邻国之

一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理应在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力。俄朝利用地利之便开展安理会决议限制之外正常合作的权利也应受到尊重,朝鲜要对外开放,自然首先要对周边国家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普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金正恩之后就直飞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俄元首很可能单独会晤,双方会谈将谈及半岛问题。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显然包括双方在半岛问题上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总的来看,两国的半岛问题立场是高度接近的。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半岛问题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得到包括朝鲜在内的各方的确认,半岛实现永久和平、保障朝鲜安全的目标则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的确认。问题在于美朝高度的互不信任使得双方很难就

实现这些目标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是目前半岛问题的关键点。

美朝的互信无法在两者之间凭空建立起来,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有效的帮助。中俄可以也应该在推动朝美增加互信和起类似“信用担保”的作用方面有所作为。

普金在与金正恩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要实现无核化与裁军,有必要从国际法上保障朝鲜的安全,为此六方会谈应该重新启动。我们认为,普金重启六方会谈的建议很契合当前的形势,相信中方会有积极回应。美韩日也有必要认真考虑普金的建议。

朝鲜已经停止核试验和战略导弹试射,美韩也停止了针对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还承诺了无核化的终极目标,这一切共同促成了半岛局势的新局面。这种情况下作为鼓励而减少对朝鲜的部分制裁是国际社会应有的态度和行

动,中俄两国就这个问题加强协调,形成必要的推动。

平壤下决心会给予支持。华盛顿将阻止朝方实施这一计划作为施压后者做更多让步的筹码,这不是个好思路,半岛这一轮缓和之前的激烈动荡已经表明,美国光靠施压是达不到目的的,华盛顿需要采取更灵活的态度,维持它与平壤谈判及互动的活力。

俄罗斯作为一支促和力量更活跃地参与半岛进程,有利于增加整个局势的理性元素,塑造国际社会对半岛问题更加实事求是的认知。韩国在半岛问题上还是对美国跟得有点紧,促美国与朝鲜相向而行的力度不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韩国舆论对半岛问题的认识受美国主张的影响比较大。

中俄朝三国加强沟通与交流对维护半岛当前的和平局面有利,也对推动朝鲜核谈判进程往前走是积极的,因此其他方面都应给予支持。▲

中国制度能力优势体现在哪

樊 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关键历史节点和重大挑战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成功跨越那些貌似难以逾越的障碍。立足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中国政治体制历经考验,能够继续担负历史使命的关键,在于党和国家强有力的制度能力,新时期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要更加注重中国自身的制度优势,它们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当时国家发展任务和社会结构,建立了延续至今的党和国家基本体制,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套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高度分散在不同的职能体系和决策板块。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最广泛地区的积极性,发挥各职能系统的管理优势,延续了分权决策、分工负责的基本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有美国学者把中国政治体制不恰当地描述为“碎片化的权威体制”,意在说明中国政治体制中潜在的政治离心力,国内有的媒体也常常以“九龙治水”来形容其负面特性。在她们看来,中国的决策权被纵向与横向高度分割的决策部门和平台所共享,使中国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决策不得不依赖于反反复复的博弈和协商。

但是,正是这样一套貌似碎片化的体制,却在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批量提供了高级管理人才,形成中国特色人才“集团军”效应,成就了中国工业化和改革发展的重大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分工负责的体制保持了官僚系统之间必要的均衡和制约,上报中央审议的重大决策方案,需经各系统、各部门集体商讨磨合达成基本一致,“协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最大的“程序正义”。注重部门职能的均衡性,形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的机制,有利于重大决策的责任落实,规避了政策出台后,可能出现的执行困难不相衔接的尴尬,这种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体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保障了中国重大决策的安全,较好地落实了执政责任。

回顾过去70年,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能力体现为能够在

“收”与“放”之间运用自如,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将分散的权力和制度资源加以整合、衔接。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未必所有的政治体制都能够在保障积极性的同时,又将分散的系统板块统一到国家发展的“一盘棋”中。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意愿,但是未必有这个能力。英国工党很早就提出了“协作政府”的口号,目标明确指向增加政治凝聚力,数年前英国某官方智库在向内阁提出的报告中,批评英国体制缺乏某种深层次的决策整合与共识构建的“系统管控能力”,并建议将此作为英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同一些西方政治体制比较,中共的领导体系优势在于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分权,都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及时“收敛”。改革开放是分权的大时代,中共依然能够通过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力对全国性的干部实施统一管理。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领导经验,并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摄”,而是一种政治系统驱动下的集体“协作”。在今天,西方现行的选举政治体制中,更多情况是一种非协作性甚至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受惠于党统一领导的组织优势和长期执政优势,决策的根本目标不在于胜败,而在于寻求广泛的同意性和基本一致性,系统内广泛的意见和诉求将得到反映。这种系统驱动的能力,不仅在分权为主的制度体系下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改革后期矛盾交织、风险联动的形势下,运用得当可以达到增强改革整体性、系统性、统筹性的目的,更好形成多要素联动的“制度合力”。

早在20世纪初,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曾判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受惠于中国健全的制度能力。相较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和国家体系的重要特点和优势,正是依赖其强有力的制度基础和国家基础能力。如果仅有政治领导和高效的决策能力,而缺乏国家基础能力的保障,政治领导权就是空中楼阁,执政责任难以落实。中国的国家制度体系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奠定,改革时代因应时宜

不断变革完善,在金融财经、市场监管、社会民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提供了所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供给。事实上,不唯市场经济发展,整个国家的重大决策执行、公共产品的普惠性高效供给,乃至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广,都仰赖于一套强有力的国家基础能力,国家基础能力和制度能力是中国安全稳定的“压舱石”。

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和国家基础能力,能够保障党和国家机构的高效运行,要完成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的任务,还应给予中国广泛的市场和社会力量以稳定的信心,形成高效协同的治理格局。在西方政治自由主义所塑造和引导的政治实践图景中,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被视为社会权力的主要载体,公共空间则被视为有效抗衡国家的社会专属的政治空间。但是反观改革时代的中国,尽管社会力量不断扩大,但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公民社会假说的、国家权力完全不可染指的“公域”,中国的国家权力始终保持着与社会的广泛互动,总体上较为成功地维持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平衡,促进了国家与社会共同发展。多数西方国家过分重视社会横向关系的构建,重视市场、社会同国家的对抗和制衡,结果带来社会同国家公共事业的“脱嵌”,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成本。相比之下,中国更加重视市场和社会机构同党和国家机构的纵向“链接”,各级政府积极吸纳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体制建设,使基层党组织、政府与群众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有效衔接起来,共同构筑、参与国家发展的任务。

当下,在社会加速“再组织化”和新技术革命的今天,市场、社会和传统政党、国家的组织形态冲突加大,博弈增强,世界范围内各国都面临相似的难题,政府已经丧失大规模快速动作的能力,所有制度都被部分执行。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受制于更广泛的新兴机构、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如何在人才、组织和技术等多层次同更好发挥中共政治体制优势,将成应对挑战、完成使命的关键一环。▲(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日前,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在5月份结束对伊朗进口石油的8个国家和地区的制裁豁免。受此影响,国际原油价格迅速发生波动,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在美国力图将伊朗石油出口“清零”的情况下,伊朗能否挺过这一轮的制裁。

结合伊朗伊斯兰革命40年长期处于制裁之中的历史,以及美国此前两轮制裁的影响来看,笔者认为伊朗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不会垮,也不会在美国面前屈服。

从经济和社会层面看,美国此前两轮制裁的能量已经得到较大释放。受制裁影响,伊朗的原油出口,已经从制裁前每天250万桶左右降至100万桶左右。当然,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尤其是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对伊朗经济构成严重冲击。可以预见,如果把目前每天100万桶左右出口“清零”,伊朗经济状况会更加恶化,但应该不会有经济全面崩溃的可能。此外,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已对应对制裁做了大量准备。近期,虽然发生程度不等的民众抗议,但是并不存在能够对伊朗现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有组织反对派。

伊朗不会向美国屈服

刘中民

从政治层面看,美国新一轮的制裁会进一步促使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加强鲁哈尼政府和保守派的团结。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鲁哈尼已通过撤换数位部长来回应保守派的压力;在议会内,保守派对鲁哈尼进行质询的过程中,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对保守派进行了抑制,以避免双方的对抗。由此可见,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宗教领袖必然会更加对保守派与温和派的平衡和管控,而两派力量在美国的重压之下也必然会把应对美国强权的“民族大义”放在首位。

伊朗无论在具体举措上如何应对,都不会在美国的压力面前屈服。从短期来看,对内如何保障民生,避免货币再度出现大幅贬值、通货膨胀失控等,将是其近期内的重中之重。此前,伊朗政府已采取大幅减少进口物资种类、收紧外汇兑换、打击货币黑市交易等做法,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伊朗民众出于民族自尊心,也会在配合政府、进行自救方面采取理性的做法。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伊朗会根据美国制裁对自身影响的程度,以及相关各方尤其是欧盟、俄罗斯对其予以回应的力度,选择是否退出伊核协议。当然,在此过程中,伊朗仍会以各种适度、且可能体现其不屈服意志的方式,如军事演习、加大在伊核协议框架下合法浓缩铀活动等,对美国的压力做出强硬反应。

总之,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和长臂管辖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其结果仍无法逃避美国中东外交“损人害己”的窠臼。若最终结果是伊朗退出伊核协议,并走上核武器开发的不归路,不仅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会遭到严重破坏,中东地区再度发生战争的风险也会上升。这无疑是美国政府应该三思的问题。▲(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